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梅文化论丛

程 杰 著



中华书局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梅文化论丛

程杰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文化论丛/程杰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5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5484 - 2

I . 梅… II . 程… III . 梅 - 文化 - 中国 - 文集

IV . S685.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446 号

书 名 梅文化论丛

著 者 程 杰

从 书 名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责 任 编辑 俞国林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6 1/4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 际 书 号 ISBN 978 - 7 - 101 - 05484 - 2 / 1 · 759

定 价 32.00 元



程杰，1959年3月生，江
苏泰兴人。文学博士，现为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
《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宋代
咏梅文学研究》等。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 陈书录 儒商及文化与文学
徐克谦 先秦思想文化论札
王青 先唐神话、宗教与文学论考
张采民 心远集——中古文学考论
程杰 梅文化论丛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封面设计 王铭基 周玉

目 录

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

——关于国花问题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思考	1
关于梅妃与《梅妃传》.....	26
“岁寒三友”缘起考.....	34

两宋时期梅花象征生成的三大原因	47
宋代梅花审美认识的发展及其成就	70
宋代梅品种考	88

中国古代梅花题材音乐的历史演进	107
《梅花三弄》起源考	125

墨梅始祖花光仲仁生平事迹考	134
“潇湘平远，烟雨孤芳”	

——论花光仲仁的绘画成就	144
元代墨梅画家吴太素应是浙江余姚人	158

“香发《早梅》篇”

——读齐己《早梅》	165
龚自珍《病梅馆记》写作时间与相关梅事考	169

论庾岭梅花及其文化意义	179
苏州邓尉“香雪海”研究	193
杭州西溪梅花研究	212
[附录一]“杏花春雨江南”的审美意蕴与历史渊源	235
[附录二]刘基《张伯雨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249
后记	254

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

——关于国花问题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思考

牡丹、梅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清朝于1903年确定牡丹为国花,有着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至少在当时的京师地区如此。1929年民国南京政府创议梅花为国花,并正式通令全国作为徽饰图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政治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发展,文化建设方面的要求也不断高涨。在有关国花和名花的倡议、评选中,牡丹与梅花一直名列前茅,呼声最高。1994年中国花卉协会正式组织了大规模的国花评选活动,评选领导小组的最终意见是以牡丹为国花,其他呼声较高的兰、荷、菊、梅为四季名花。但这一结果未见进一步的权威认定,更未进入立法程序,民间讨论仍在进行之中。笔者主张牡丹、梅花两花并仪,即两花并列为我国国花,这是由两花旗鼓相当的历史地位和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所决定的。追溯历史,牡丹与梅花的文化地位是分别由唐、宋两代奠定的,本文拟就牡丹、梅花在唐、宋两代相继兴盛的因缘背景、文化意义略作探索,借此对当今国花的评选与讨论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一、北方和南方

牡丹与梅花有着不同的生理习性和地宜条件。据现代生物学,牡

丹属毛茛科小灌木，作为一个物种，古已有之，其原产地在我国西北。喜温凉气候，性较耐寒，而不耐湿热。喜疏松肥沃、通气良好的壤土或沙壤土，忌粘重土壤或低洼涝积之地。这些都表明，牡丹适宜于北方地区生长。从现存唐宋之际的牡丹史料看，野生牡丹主要分布于北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①。人工栽培牡丹更是盛于北方，其核心地带是当时的长安和洛阳两京。长安牡丹起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唐玄宗开天年间声名大振，至中唐贞元、元和间“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②。洛阳牡丹至迟可以追溯至隋炀帝营建东都御苑时易州所进牡丹十数种。唐之中盛，洛阳牡丹虽不如长安，但也不可忽视。洛阳外城尊贤坊成德军节度使兼侍中田弘正宅、宣风坊安国寺两处“牡丹特盛”^③，五代后唐庄宗临芳殿前“牡丹千余本”^④，入宋后，经数十年酝酿，洛阳牡丹盛况空前，名扬天下。京、洛之外，太原、汾州等地乃至西北边陲都有牡丹栽培之迹。而在南方，牡丹栽培极其困难。唐时南方地区仅杭州、成都等少数地方有移植，而且规模极其有限。徐凝《题开元寺牡丹》：“此花南地知难种，慚愧僧闲用意栽。”^⑤白居易《看崔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⑥李咸用《同友生题僧院杜鹃花》：“牡丹为性疏南国。”^⑦《牡丹》：“少见南人识，识来嗟复惊。”^⑧入宋后城镇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活跃，花卉园艺业蓬勃繁兴，吴越、巴蜀等地积极引种牡丹，杭、越牡丹始享誉东南地区。中州沦落，宋室南渡，牡丹圃艺四散南移，彭州（今四川彭县）、徽州黟县（今属安徽）等地都是牡丹南下的中枢要地而呈繁兴之势。尽管如此，牡丹之在南方，终不如北方之得地利气和。李纲《初见牡丹与诸季申

①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品叙第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舒元舆《牡丹赋》，《文苑英华》卷一四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第161、16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陶穀《清异录》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全唐诗》卷四七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全唐诗》卷四三六。

⑦《全唐诗》卷六四六。

⑧《全唐诗》卷六四五。

伯小酌》：“牡丹家中州，尤者西邑洛。姚黄妃魏紫，余品皆落寞。南方瘴疠地，寒暑互参错。浪蕊与浮花，未春先已作。安能萃和气，孕此木芍药。”^①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气温偏高，地气低湿，即或着意培植也很难大有作为。

梅花恰与牡丹相反，是典型的南国之树。“梅华畏高寒，独向江南发。”^②虽然梅花花期早，腊尾年头迎霜冲雪，但其性却不耐寒。牡丹能耐零下30℃的严寒，而梅树在零下15℃以下就难以存活。梅花在平均温度16~23℃的地区最宜生长。虽然梅花也忌土壤涝渍，但喜欢湿度较大的气候条件。这种温润习性决定其自然分布主要在我国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尤其是长江沿岸和江南的丘陵、山地。从历史上看，商周至秦汉之际黄河流域的气候似较今日温暖、湿润，自然生态条件较好，但《诗经》十五国风唯召南、陈风、秦风、曹风提到梅树，其地也只是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及河南、山东一带。汉魏乐府中有《梅花落》，其创作背景在洛阳一线。随着北方地区气候的变迁，尤其是生态植被的衰退，梅花在北方地区的分布越来越少。而在南方地区，随着经济开发和人口增长，梅花越来越受到重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就曾以梅枝作为外交礼物赠送梁国，六朝陆凯驿寄梅花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南朝乐府如《西洲曲》、《子夜四时歌·春歌》等都以折梅相赠作为表达相思恋情的方式。咏梅诗赋在南朝开始大量出现。隋唐之际，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生发展，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历史气候进入第三个温暖期^③，北方地区便不乏梅花栽植之迹，如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④王绩是河东（今山西）人，其故乡庄园植有梅花。尽管如此，北方之梅艺远不能与南方相比。南方的山壑水滨、村间道旁野生梅要远多于北方，晚唐罗邺《梅花》：“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放过江来。”^⑤道出了南方地区梅花普遍

^①李纲《初见牡丹与诸季申伯小酌》，《梁溪集》卷三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蔡襄《和吴省副青梅》，《端明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第48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④《全唐诗》卷三七。

^⑤罗邺《梅花》，《全唐诗》卷六五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分布的自然优势。唐诗中今存为数不多的咏梅诗，大多出于南方或中原南下的士人，写作背景大多是吴越、湖湘、巴蜀等地，时间上也多在“安史之乱”之后，尤其是北方连年干戈动荡，南方经济文化优势逐步显露的晚唐五代时期。中唐以来，江南文人赏梅艺梅活动已成声气，白居易在杭州即有“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赏自初开直至落，欢因小饮便成狂”^①的诗句。入宋后，林逋以“孤山八梅”开领风骚，也可谓是渊源有自。北宋中期开始，“凤山亭下赏江梅”^②已成为杭州一景。苏颂《本草图经》记载当时梅花“今襄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③。南宋赵蕃《次韵斯远折梅之作》写道：“江南此物处处有，不论水际仍山颠。”^④

而同期北方地区的梅花，随着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尤其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大为衰落，几成绝迹。欧阳修贬居夷陵、滁州，当地山中野梅密布，而任职滑州（今河南浚县），有诗道：“惜哉北地无此树，霰雪漫漫平沙川”^⑤。滑州滨临黄河，已无梅可观，北方其他地区更是不难想见。郑獬《和汪正夫梅》其五写道：“应为长安恶风土，故教北地不栽梅。”^⑥杭州人强至于英宗朝受辟永兴军幕职，在长安六年，有《立春》诗道：“六年不见江梅影，长觉归心似旆摇。”^⑦同时田锡、宋庠、梅尧臣等南方士人任职北方春间都有诗感慨北方少梅。而北方人由于少见寡闻，久而久之，对梅花也就显得生分，有关知识十分贫乏，常把梅花与杏花混作一物，以至南籍诗人每每引为笑柄。淮阴徐积《和吕秘校观梅》写道：“北人殊未识，南国见何频。”^⑧江西晏殊、王安石咏梅诗中都有对“北人不识”的讥诮与调侃。北宋中后期的汴京和洛阳等地，公私园林曾积极引植梅花，如晏殊庆历间由苏州引植红梅于京

①白居易《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全唐诗》卷四四六。

②郑獬《江梅》，《鄭溪集》卷二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年影印本。

④赵蕃《淳熙稿》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欧阳修《和对雪忆梅花》，《文忠集》卷五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鄭溪集》卷二八。

⑦《祠部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节孝集》卷一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城宅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记诸园中富郑公园“梅台”、湖园“梅台”、大隐庄“早梅”都是梅花专题景观。另李氏仁丰园(见《洛阳名园记》)、文彦博园(文彦博《梅花》)、赵韩王园(宗泽《题赵园》)、王拱辰环溪(司马光《和子华游君贶园》)、邵雍安乐窝(邵雍《和宋都官乞梅》)、张氏(景昱、景昌兄弟)南园都植有梅株。蜡梅这一梅花新品也由京洛地区首先发现。但是,综观北方地区的梅花,虽然受到一定的注意,但主要局限在汴、洛一线及黄淮之间,野生分布和园艺普及都远不如南方。宋室南渡之后,版图止于淮、岭,吏民集中于江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展,经济文化重心彻底转移至南方,梅花以风土之利兼人气之旺,圃艺观赏蔚然成风,盛况空前。“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①,以至于“呆女痴儿总爱梅,道人衲子亦争裁”^②,“便佣儿贩妇,也知怜惜”^③。新品异类层出不穷,园艺谱录类著作纷纷出现,艺梅赏梅活动进入鼎盛时期。

上述可以看出,牡丹与梅花的此起彼伏、先后兴盛,与唐宋之际社会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南北转移密切相关。唐王朝坚持“关陇本位”政策,秦陇(今陕西、甘肃)、河南、河东(今山西)为政治、文化重心,尤其是秦川平原经济繁荣,京畿地区人烟骈阗,因而牡丹首先在都城长安兴起。五代、北宋政治中心转移至汴洛地区,洛阳牡丹应运而起,盛极一时。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渐趋活跃,梅花越来越受到注意。入宋后尤其是南宋时期,梅花人气益旺,地位飙升,逐渐取代牡丹而后来居上。牡丹与梅花审美地位的交替变迁,反映着唐宋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区位格局的基本走势。

^①范成大《范村梅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杨万里《走笔和张功父玉照堂十绝句》其三,《诚斋集》卷二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吕胜己《满江红》,《全宋词》第1759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二、“富贵”与“隐逸”

花卉中“富贵”与“隐逸”的对立出自周敦颐的《爱莲说》，周氏以菊花为“隐逸”之花，牡丹为“富贵”之花，认为莲花超越二者，是体现儒家理想的“君子”之花。我们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唐代牡丹、宋代梅花两个时尚风潮在审美文化主体方面的差异。

牡丹之视为“富贵”，固然有着花容花色即视觉形象上的原因，这在下一节将进一步讨论，但追溯其在隋唐时期的兴盛历程，却由贵族奢赏、都市宴乐的社会风尚所决定。首先，从缘起看，牡丹发迹于隋唐之际，最早得力于宫廷帝王及后妃的青睐。隋炀帝令易州进牡丹，唐高宗曾召群臣宴赏双头牡丹，武则天命西河精舍的牡丹佳品移植内廷，开元中唐玄宗与杨贵妃乘夜游赏沉香亭前牡丹，召李白赋诗、李龟年高歌助兴。中唐文宗再现“赏名花，对妃子”^①的风流，激赏李正封“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②之句，牡丹因而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这一系列风流传说，都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室是当时牡丹时尚的先锋与主导。另一对牡丹兴盛作用较大的是达官显贵、佛寺道观。“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③。据唐宋诗文笔记等材料，杨国忠、李益、元稹、李德裕、裴士淹、刘禹锡、令狐楚等名流私宅均有牡丹。唐代寺院经济发达，长安慈恩寺、崇敬寺、兴唐寺的牡丹都负盛名。

与此相联系，牡丹时尚表现为都市宴游之风气。舒元舆《牡丹赋》：“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④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

^① 阮阅《诗话总龟》卷二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李浚《松窗杂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司马扎《卖花者》，《全唐诗》卷五九六。

^④ 《文苑英华》卷一四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玩为耻。”白居易《牡丹芳》：“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辇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①因酷嗜牡丹，不惜重金争购名品。“牡丹一朵值千金”^②。“帝城春欲暮，喧哗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③这种情景同样见于北宋洛阳。汉晋以来洛阳便称缙绅世家渊薮，唐宋时为陪都，衣冠贵人投闲致仕乐于归居，北宋时甲第园池富甲天下，牡丹得以承唐遗势迅速风盛。当时都市游赏风俗也相应兴起，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就专列“风土”一项。

由此可以说，牡丹时尚主要是王公贵族、都市豪门富贵奢华生活的内容。隋唐是门阀遗风依然显著的社会，京、洛两地更是豪族权贵辐凑之地。汉晋以来，京洛豪贵声色犬马、奢肆游宴之风相沿不绝。至唐之中盛，由于国力的强盛、商业的繁兴，“仆马豪华，宴游崇侈”^④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可以说牡丹正是应时而起、富贵炒作的新题材。那“花开时节动京城”^⑤的狂热，“牡丹一朵值千金”的豪纵，“名花倾国两相欢”^⑥的浪漫风流，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处于社会主流和政治骨干地位的阀阅世家、都市富豪骄纵恣肆、风流华贵之生活作风的体现。

在这富贵繁华的生活氛围中，牡丹生物种性的娇艳糜费，客观上增添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牡丹对土性地力要求较高，园艺栽培技术性较强，非一般经济条件所能承受。寻常人家即使栽几株，也难以指望有珍品异株出现。作为都市风尚，唐宋两代规模不等地都形成了相应的技术行业和商品市场，呈现着都市消费经济的色彩。所以牡丹之盛，亦即代表都市社会的繁荣、地方经济的兴旺。唐宋之后虽然牡丹栽培呈现四方播衍之势，但规模生产和商业运行总在闾阎繁盛、

^①《全唐诗》卷四二七。

^②张又新《牡丹》，《全唐诗》卷四七九。

^③白居易《买花》，《全唐诗》卷四二五。

^④孙棨《北里志》，《说郛》卷七八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刘禹锡《赏牡丹》，《全唐诗》卷三六五。

^⑥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全唐诗》卷一六四。

经贸发达之地。

正是贵族豪门的主导和作为都市繁华宴游的社会属性,奠定了牡丹之作为富贵繁华生活象征的基础。至迟晚唐五代时牡丹就视为富贵奢华之物。如裴说《牡丹》:“未尝贫处见,不似地中生。”^①归仁《牡丹》:“天下更无花胜此,人间偏得贵相宜。”^②无名氏《牡丹》:“倾国姿容别,多开富贵家。临轩一赏后,轻薄万千花。”^③同时牡丹风尚也因此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思。中唐以来,针对“一国如狂不惜金”^④,“破却长安千万家”^⑤愈演愈烈的风习,白居易等人从国计民生和政教风俗的立场不断提出讽谕和批评,这可以说是从反面揭示了牡丹时尚之富贵游赏、消费经济的实质。

而梅花迥异于斯。首先,与牡丹之盛得力于京畿皇室和贵族不同,梅花之受尊尚,起于南方下国的湖山隐士林逋。林逋以隐士之心性、视野去观照体悟梅花,视梅花为天酬僧隐的独特风物,“澄鲜只共邻僧惜,冷落犹嫌俗客看”,着重挖掘其“众芳摇落独喧妍”,“疏影横斜”、“暗香浮动”^⑥的独特神韵与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梅花也因之与闲隐之流结下不解之缘。林逋之前,唐末陆希声《阳羡杂咏十九首·梅花坞》写道:“冻蕊凝香色艳新,小山深坞伴幽人。”^⑦诗作于其闲隐义兴(今江苏宜兴)时,已流露出引梅为隐处知己的心迹。林逋稍后的文同在《赏梅唱和诗序》中写道:“梅独以静艳寒香,占深林,出幽境,当万木未竞华侈之时,寥然孤芳,闲淡简洁,重为恬爽清旷之士所矜赏。”^⑧南宋陆游在回答曾几“梅与牡丹孰胜”时说:“一丘一壑过姚黄(牡丹)。”^⑨梅花被视为志节自守、离世高蹈者的至爱和象征。虽然梅花的精神象征最终远未局限于“隐逸”世界,但至少在周敦颐发表

^①《全唐诗》卷七二〇。

^②《全唐诗》卷八二五。

^③无名氏《牡丹》,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上册第 535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④王穀《牡丹》,《全唐诗》卷六九四。

^⑤徐夤《牡丹花二首》,《全唐诗》卷七〇八。

^⑥《山园小梅二首》,《林和靖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全唐诗》卷六八九。

^⑧《丹渊集》卷二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梅花绝句》,《剑南诗稿》卷一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牡丹为“富贵”之花、菊花为“隐逸”之花的时代，梅花与菊花一样多为隐者所矜赏。后来梅花广受世人推尊，举为精神高标，但耿介幽独、闲静淡泊的意趣神韵仍是其最基本的风范。就此点而言，梅花与菊花一样，是与牡丹之“富贵”属性相对立的“另类”选择。

而梅花又远非“隐者”之专利，就梅花欣赏来说，比隐者的因缘知遇意义更大的是在广大士大夫及民众中的普及优势。梅花野生资源丰富，野生梅遗核即生，江淮以南山间水滨、乡村原野极其普遍^①。梅花的园艺栽培也极为简便，技术平常，牡丹品种中如姚黄、牛黄、魏紫、左花、苏家红、林家红之类品名，都俨然有着技术“专利”的印迹，而梅花却未见此类现象。一般士大夫私宅屋角墙隅孤植一二，或乡村民居田头篱边零星闲布，是极为常见的事。梅花花果兼利，也更易为一般平民所接受。“屋角墙隅，占宽阔处，种两三株。”^②“墙角栽梅分两下。夹竹穿松，巧傍柴门垂。”^③“何必江头千树暗，未如屋角数枝斜。”^④这是当时梅花栽培中最普遍的现象，带着日用家常的气息。虽然实际的园艺经营仍有经济条件的差别，但与牡丹相比其社会普及优势也属显而易见，而这正适应了宋代社会的新形势、新格局。

宋代是一个荡涤了豪门世家阀阅势力，以广大中小官僚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社会。封建官僚政治的确立、地主和自耕农经济的发展、城乡百业偕兴流通加剧都显示着平民化、近世化色彩，反映在文化上则是以广大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流的世俗家常、平易近人的人文氛围。梅花以其江南山间村野随处可见、平淡无奇的生物种性优势，既适应广大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的经济状况和生活面貌，同时也契合其世俗平民化的文化趣味和精神理想。梅花果实滋味载诸《诗》、《书》，魏晋以来既以花闻，只有到宋代才被推向文化时尚的前沿，成为士人生活情景的写照、精神风范的象征，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殆在于此。可以这么说，梅花既是隐者之花，更是士人之

^①范成大《范村梅谱》。

^②扬无咎《柳梢青》其十，《全宋词》第1197页。

^③吕胜己《蝶恋花》，《全宋词》第1752页。

^④卫宗武《为僧赋梅庭》，《秋声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花、平民之花,是平民社会亲切宜人的家常风景、广大士大夫普遍易行的诗意点缀。

宋人对梅花的认识也无不定位于江湖村野,定位于士人平民。“花不向沈香亭上看,树不着唐昌宫里玩。”^①“自羞贫女钗边朵,难傍宫人额上花。”^②“本是前村深处物,竹篱茅舍却相宜。”^③“雪后园林、水边篱落,似全其真,若处之名园上苑,对之急管繁弦,是四皓之去商山,夷齐之入瑶室矣。”^④“梅兄随遇处,在天涯山巅。……仍多向贫家,不为华屋牵。”^⑤这些北宋后期以来的言论,强调的都是梅花作为隐者逸流之花、士人平民之花、家常闲居之花、山林村野之花的社会属性。上溯唐朝,早在王公贵族竞趋夸赏牡丹之时,就已经出现了标榜梅花以为抗衡的意向。前引晚唐罗邺《梅花》:“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放过江来。”不仅揭示了梅花分布的南、北差异,同时也明白地表达了江南寒士得天独厚、鄙物自矜的傲慢心理。虽然诗中没有明确提到牡丹,但联系中唐以来京洛豪门权贵酷嗜牡丹的实际,不难把握以南梅应对牡丹这一京都奢尚的潜在意识。

当然一切都是相对的,无论牡丹还是梅花,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社会同美共爱的现象,唐代牡丹诗赋相当一部分出于下层士人之手,而宋时梅林、梅溪、梅屏、梅苑一类园艺建设大多属于衣冠贵人,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的审美资源也越来越倾向于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在唐宋时期,牡丹、梅花两大时尚的先后出现毕竟孕育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缘发于两种政治、经济地位不尽相同的社会阶层,体现着社会形态和封建文化由门阀贵族型向士绅平民型的深刻演变。从下节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正是这种不同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牡丹与梅花人文意趣和文化意义的分殊。

^①陈亮《最高楼·咏梅》,《全宋词》第2105页。

^②刘克庄《赵礼部和予梅花十绝……》,《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〇,《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谢逸《梅六首》其二,《溪堂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刘学箕《梅说》,《方是闲居士小稿》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包恢《马上口占感梅感事二首》其一,《敝帚稿略》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